

莫斯科日记

[法] 罗曼·罗兰著 夏伯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杨德鸿

莫斯科日记

[法]罗曼·罗兰 著

夏伯铭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南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43,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30,001-35,000

ISBN7-208-02141-4/K·463

定价10.00元

译者前记

1935年6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和妻子玛丽亚一起访问苏联。他们于6月17日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隐居地维勒讷沃出发,6月23日到达莫斯科,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

这是罗曼·罗兰漫长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对苏联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斯大林两次会见了他: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专门接见他,回答他的问题;另一次是在莫斯科近郊的高尔基家中共进晚餐。此外,罗兰还与布哈林、亚戈达等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有过多次私下接触。他还接待了来自苏联各地和各界的许多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一些名胜古迹。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和返回瑞士维勒讷沃后不久,罗曼·罗兰在给许多朋友和熟人的信中,都谈到访问莫斯科的印象。6月26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妹妹马德莱娜:“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分完全不相称的,有时使我觉得有点吃不消,但也是十分动人的。昨晚在大剧院,他们指定给我的座位是以前沙皇专用的包厢。这个包厢平时给外交使团使用,这次让外交使团坐到别处去了。人们没完没了地向我欢呼,不论在剧院外,还是在剧院内,在剧院入口处,接着在第三场中间休息时的片刻;在剧院外面,在台阶上下,在广场上,一群热情的男女向我欢呼。谁

还能说莫斯科的群众是军队编制的！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表现是与上级的指示恰恰背道而驰的，上级指示是要让我安静。群众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在纷乱中，我努力与一些人握手，可我得有十万只手才够用。你可以想象，你的年老哥哥站在大包厢内，高举双臂，笨拙地时而向左边、时而向右边挥手致意。但他没有太慌张。他像看戏一样，注视周围的一切，注视他自己。”

7月9日，罗曼·罗兰从莫斯科告诉评论家克里斯蒂安·塞内沙尔：“经济情况看来很好。最近一年来生活大大改善了。这个现有400万居民的巨大城市，就像是健康、热烈、井然有序的生活瀑布。在这个健壮活泼、保养得很好的人群中，我们自己倒成了来自饥饿地区的外来人。”

7月12日，罗曼·罗兰从莫斯科写信给法国诗人和剧作家马塞尔·马蒂内：“我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谈话。我在近处看到了战斗仍在继续的真正战场，我在这儿比在法国更能理解这种战斗。”在另一封罗曼·罗兰给前妻克洛蒂尔德·布雷亚尔—科尔托的信中，我们读到：“总的说来……我形成并保留了充满难以想象的活力、信心和欢乐的印象。在25至30岁的人们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欢乐尤其吸引人，他们已是在革命时期长大成人的。”

8月5日，已返回瑞士的罗曼·罗兰在给志同道合的朋友让—里夏尔·布洛克的信中承认：“至于情况的复杂性，它完全出乎想象，而且，最好是口述，而不是写在纸上。在这个非凡的苏联，生活着20多个民族，并且已生活了多少个世纪！”同一天，在给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韦格的信中，罗曼·罗兰谈到了此次访苏的主要印象：“毫无疑问，革命在劳动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千千万万的人知道，革命——这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一切都归功于革命。”

从上述信件片断中，我们不难看出罗曼·罗兰对访问苏联的基本印象。但是，要了解他这次访问苏联时每天活动的详情，要了解他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对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高尔基和苏联其他作家的褒和贬、爱和憎的详情，最好是读他的日记，而一生都勤于写日记的罗曼·罗兰，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当然也不例外，他在日记中写下每天的活动和感想。1935年8月，在返回瑞士后不久，罗曼·罗兰对日记做了修改和补充，亲自打印，装订成册，成为一部独立的作品，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7月》。为方便起见，我们易名为《莫斯科日记》。

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罗兰虽然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尤其是个人崇拜的做法感到不解和不满，但对斯大林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在离开莫斯科时，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并同意将这封信刊登在《真理报》上。

但是，在莫斯科之行一年后，斯大林发动了引起全世界愤怒的清洗反对派的运动，罗曼·罗兰对斯大林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改变。1936年8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黑暗审判甚至使苏联最好的朋友也感到不安。在作出死刑判决几小时后就处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8月25日），这使我感到心灰意冷。可以对阴谋的主要组织者不怀有敬意，也可以相信对他们的控诉——可你仍会感到不安。1794年，在处决丹东后的第二天，国民公会的最优秀成员们也有过类似的不安。8月25日，在处决当天的晚上，从莫斯科的法语广播中传来疯狂而恶毒的谩骂，这种谩骂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就是这种既侮辱被处决者，也侮辱为他们鸣不平的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官方声音，却对路易十四、即斯大

林大唱赞歌，称他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太阳’，这是多么不文明的反差！难道斯大林及其近臣完全丧失了理智？在这种时刻，优秀领导人的职责是走到一边，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应该谈论的不是因威胁斯大林的生命而进行报复，而是社会安全。恐怕在这件事上，愤怒和傲慢的本能已战胜了政治理智。不过，现在我对许多东西的了解比去年更清楚了。”

罗曼·罗兰还在另一则日记中说：“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我谴责对个人的盲目崇拜，无论是对斯大林，对希特勒，还是对墨索里尼。”

莫斯科之行是罗曼·罗兰生平极其重要的一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他非常勇敢的一次政治活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使罗兰的敌人更加憎恨他，也使罗兰的朋友更加尊敬他。因此，《莫斯科日记》对了解罗曼·罗兰一生的思想演变，对了解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无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人却无缘见识《莫斯科日记》的庐山真面目。罗曼·罗兰的传记作者，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写到罗曼·罗兰的这段无可回避的历史，都只能无奈地根据零散的、甚至是错误的资料进行推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莫斯科日记》原稿的标题页上，罗曼·罗兰写有以下题词：“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那么，为什么罗曼·罗兰不准在50年之内出版《莫斯科日记》呢？他本人没有说，后人当然也无从知道，只能猜测。而据译者推测，部分原因或许与高尔基有关。

罗曼·罗兰的莫斯科之行是应高尔基邀请，他在莫斯科的绝

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高尔基家中，这说明了他与高尔基的特殊友好关系。虽然他与高尔基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他从1916年起就开始与高尔基通信，与高尔基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在《莫斯科日记》的结尾部分，罗曼·罗兰用较大篇幅分析了3个人的品格特性。这3人是斯大林、高尔基和亚戈达。他十分尖锐地写出了高尔基的个性弱点。因为是写日记，他当然得实话实说，不必有所顾忌。但牵涉到公开发表，他当然不能无所顾忌。他决不能伤害与高尔基的长达20年的友谊。在罗曼·罗兰后来悼念高尔基的文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友谊的深度。

1936年，在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不到一年，高尔基就去世了。高尔基的死亡被罗曼·罗兰看作突然的和沉重的打击。他立即在日记中说出了自己的悲痛：“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高尔基的依恋是多么深！只是在失去朋友之后，我才发觉了这种依恋之深。我们的相互依恋现在带上了悲剧色彩。我怀着强烈的痛苦感觉到，我的全部精神都寄托在明年进行新的会面的希望上。而且，我深信，高尔基同样盼望与我再次会面。1935年7月下旬，我们在莫斯科车站告别，这个时刻是我们彼此真正的亲密关系的开端。我们满以为这种亲密关系将长期继续。我学习俄语，为的是能与他单独交谈。我们有这么多的话可推心置腹地彼此倾诉！要知道，他非常孤独，亲爱的高尔基，他的内心充满忧愁和温情，而他不能向周围的人们诉说这些忧愁和温情。他本可以向我倾诉，而我也可以向他倾诉。可现在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我将何以自慰！对已故朋友的思绪时常涌上我的心头——而且不会消褪。”

1937年3月，罗兰写了一篇纪念高尔基的短文：

“我很难写马克西姆·高尔基，因为他作为朋友对我来说是珍贵的，而他的死所引起的悲痛仍然非常强烈。从那时起流逝的时光并未减弱这种痛苦，相反，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损失是多么无可补救。与我个人的依恋无关，我今天更清楚地明白，他占据的是多么重要的地位——现在，在没有他时，没有人能代替他。

也有另外一些作家，他们能像托尔斯泰那样，把自己的圣徒思想向全世界传播，或者像伏尔泰那样，率领微笑的智慧大军向不祥的旧世界发起猛攻。但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人能像高尔基那样，实现不论何时震撼大地的最强大的革命与全世界文化时代之间的联系。在苏联，他似乎成了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最高主管。他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革命领袖的密切的个人联系，他对他们以及对苏联各民族的无可争辩的影响，不仅是由于他的既表现在戏剧作品和中长篇小说中，也表现在报刊文章和书信中的多方面的天才，而且是由于他的作为反对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偏见、舞弊和罪行的坚强叛逆者的英勇的一生，由于他强有力地和不无危险地参与推翻可恶的旧制度，由于他的高傲而率直的性格，他的作为自由信天翁的独立性——所有这一切赋予他特殊的权力，他胸襟宽阔地为了知识分子的利益，为了被革命大大激发了的人的精神的进步而利用这种权力。

在莫斯科近郊，在桦树林边，在草地和树林的辽阔景色一览无遗的莫斯科河旁，有他的带圆柱的漂亮住宅。这幢贵族宅第是国家领导人出于爱戴硬塞给他的，他只是迫不得已才同意在里面客居，因为直至最后一天，他对尘世的享受始终不感兴趣，总是惆怅地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无忧无虑的和饥肠辘辘的漂泊岁月。在这幢房子里，我每天见到他坐在长餐桌的头上，餐桌上摆

着可供 60 人使用的餐具，餐桌旁是一片既有秩序又自由的景象；我看到，他如何毫不拘束地与暂时把操心事放在一边、回忆往昔的考验的名声显赫的同志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交谈。也是在那儿，我看到，他如何接待来自庞大的苏联的或近或远的城市的工人代表团和知识分子代表团，如何宽宏和认真地与所有的人交流思想，在这些人中，既有学者、艺术家和做实际工作的人，有时也有重要的军事机构或国家机构的首长，他们来自远方，为的是就良心或公务必要性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进行商讨……我看到，他如何倾听，思索，沉浸在自己的茫无边际的回忆之中。在他的记忆中，不论何时见到或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永远不会消失，总是能栩栩如生地再现……他的承受着岁月和疾病的重负的强壮身躯，他的有时被爆发的笑声或愤怒打破的温厚的宁静心态，他的自由而直率的发言，他的调皮的幽默，他的蓝色眼睛的专注的目光，这种目光有时陷入沉思，注视着他从记忆的地窖中选取的故事形象，有时射向朋友的眼睛，温和地审视这双眼睛……

20 年来我与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还进行长期通信，标志生活转折点的激烈危机，我们伟大时代的象征性戏剧的进程，都在我们的通信中得到反映。他的存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变化，并非没有痛苦的、但却是从不停顿的变化，从极度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转变成与集体融为一体、不停地沿着进步之路前进的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他在最豁达的、富有成效的精神状态中解决了这种冲突。他把昨天还庸庸碌碌地生活在不文明之中的人民群众与过去对人民无动于衷、为等级特殊地位而终日奔波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多亏了他，知识分子才经受住了自己的“8 月 4 日之夜”：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权，加入人民

的队伍,不是为了被人民群众所吞没,而是为了在人民的队伍中汲取新的力量,汲取他们传送给其他人的欢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这篇罗曼·罗兰悼念高尔基的文章直到作者死后的1948年才得以问世,在中国恐怕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这篇与莫斯科之行直接有关的文章,可被看作是《莫斯科日记》的尾声。

为方便读者深入理解《莫斯科日记》的内容,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些与《莫斯科日记》直接有关的资料。此外,鉴于许多读者虽然读过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对罗曼·罗兰的生平却不甚了了,译者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编写成《罗曼·罗兰小传》一文,供读者参考。《莫斯科日记》篇幅不算大,但内容极丰富,极具史料价值,如不对所涉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进行注释,读者对某些内容恐怕就难于理解。有鉴于此,译者做了一些注释。为便于编排,译者注释(在正文中以〔1〕〔2〕为标记)按先后顺序在正文之后单列,而作者原注(以*为标记)则列在当页下面。我们现在提及已解体的苏联时,往往称之为“前苏联”,鉴于历史上只有一个苏联,而且《莫斯科日记》中涉及的绝大多数人物早在苏联尚未解体之前就已死亡,故译者在注释中仍称之为苏联。

被作者本人尘封50年的《莫斯科日记》,终于在作者逝世50余年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高兴之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金永华和唐燕能等同志,他们为保证此书的质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愿此书能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欢迎。

1995年8月20日

目 录

译者前记 1

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1935年6月~7月) 罗曼·罗兰 1

附 记 109

注 释 138

罗曼·罗兰小传 夏伯铭 181

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1935年6月~7月)

罗曼·罗兰

6月17日 星期一

2点3刻动身去苏黎世。天气宜人，有点阴，不热。我们俩乘坐的是二等硬席包房。苏黎世的“阿比·罗亚利”旅馆宁静舒适。它位于车站对面，但在广场斜对面，单独一幢房屋，远离尘嚣。房间宽敞，床铺整洁。乐观、健谈的总侍役讲述他如何在战争前夜前往南美，而在蒙特勒遇到的一对名叫舍斯克斯的有钱人夫妇（泰里泰至科山的缆车线建造者）堪称最节省钱的楷模。他们为了不买由他们自己建造的缆车的票，竟徒步登上科山。瑞士人的精神是贫乏的。出生在这儿的瑞士人许多年后返回故土时，虽然具有健壮的身体和良好的性格特征，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缺乏勇敢精神和宽宏态度。

6月18日 星期二

4点20分动身去维也纳，途经布克和蒂罗尔。卧铺车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阴晦。朦胧而宽阔的瓦勒湖使人想起有关尼伯龙根人的史诗⁽¹⁾。从穿越奥地利边界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处在崇拜者和朋友中间。海关官员费尔德基尔赫在出示他从托马斯·曼⁽²⁾那儿得到的签名后，请求我也签名留念。卧铺车厢的查票员外号叫“文德雷尔”，是出生于蒂罗尔的奥地利人，已加入意大利国籍，是移居外国者，对我们说了许多真心诚意的恭维话。夜里下着雨。清晨，在到达维也纳之前，天空一直

是阴暗的,但当列车到达维也纳时(9点左右),太阳露了脸。

6月19日 星期三

在维也纳休息。古老的大城市,有雄伟的纪念碑和漂亮的商店。商店仍保存着雅致的情调,但空荡荡的。街上的人们穿得很简朴。忧虑而消瘦的脸。维也纳沉浸在忧郁的气氛中。玛莎⁽³⁾发现,维也纳的居民就象五六年前危机时期的莫斯科人。但在维也纳人的脸上,是绝望的表情。(当我们在归途中重新经过维也纳时,这种印象稍微缓和了一点。)“大都会”大饭店位于海利根施塔特电车线附近的河岸街——多瑙河街上。一到那儿,就要求我们接受采访。一个记者几乎哭了出来,就像来自歌剧院的“歌手”。我们以沉默对待好奇心。当问我们去哪儿时,我们回答:“去华沙。”白天我没有走出房间。服务员那故作尊严而又忧心忡忡的模样就像破了产的资本家。

6月20日 星期四

早晨9点动身,经由博古明和卡托维兹前往华沙。我们单独坐在一等小包房内。中欧辽阔的多瑙河平原越是往北越是变得凄凉和贫困,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不大的丘陵地带才使单调的景色有所改观。海关(在进出奥地利时)严格清点现金。一出奥地利国界,法语就变得没有人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年轻国家的固执的自尊心借助语言在它们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穿得不雅致,但不穷,外表使人想起小资产者。到处都有丰富的水果和饮料。但一路上都有停工的工

厂,越是接近波兰,停工的工厂就越多;一度是富裕工业区的卡通维兹烟囱林立,但现在已不再冒烟。土地是贫瘠的,多沼泽的,失去了植被。没有一条好的公路。一天内没有见到一辆汽车,只看见一两辆马车。好不容易才见到的设有标志牌的道路很快就消失在耕作粗糙的田野中。很少看到树林,树木都被齐根锯掉了。不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顶上竖着白色碑石的古怪小丘,看上去像是蚁冢,又像是坟墩。车厢内几乎所有旅客都因为毕苏斯基元帅⁽⁴⁾的去世而在袖子上套着黑纱……夜里到达华沙(晚上11点),下着雨,又脏又乱:车站正在维修。阿罗谢夫⁽⁵⁾和苏联大使达夫强⁽⁶⁾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下榻于车站对面的“波洛尼亚”旅馆;波兰人经理对俄国人(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愤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但服务员和普通人很乐意说俄语。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波洛尼亚”旅馆是法西斯分子的指挥部。但在归途中,在另一家名叫“欧洲人”的大旅馆内,人们开玩笑说,这儿是反间谍组织的指挥部。哪一家更好些?当然是后者,因为那儿的人们努力显得更有礼貌。)

6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休息,一整天都在华沙度过。早晨阿罗谢夫来访。午饭后达夫强来访,与我们一起喝了茶。他有一张漂亮的东方人的脸,但脸上表情冷淡。他谈到波兰的经济崩溃,波兰把全部财力都耗费在军事需要上。他提供自己的汽车,让我们在城内各处游玩。绿树成荫的漂亮大街,宏伟壮丽的纪念碑(肖邦、密茨凯维奇⁽⁷⁾等人),年代久远的贵族别墅,横跨宽阔的维斯瓦河的巨大铁路桥梁。老市场广场的油漆房屋与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的

一样，但色彩更柔和，风格更多样。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古老的犹太人区，在那儿遇见了与众不同的人们。一些留着络腮胡子、身穿长长的常礼服的老头在彼此进行争论。人们都缩着脖子，拱着背（连年轻人也这样），长着突出而无神的大眼睛，神态既自尊又自卑。一个神经质的年轻犹太女人差点撞上汽车，她用目光狠狠盯着汽车，但不向旁边走一步，让汽车过去。在旅馆，我收到由纪德^[8]、马尔罗^[9]和让-米夏尔·布洛克^[10]签署的电报，他们请求我向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11]致电祝贺，我照办了。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动身赴莫斯科。阿罗谢夫陪同我们，乘坐的是卧铺车厢。马塞尔·加香^[12]夫妇俩也在这次列车上。他们来找我们闲聊。经过一再请求，阿罗谢夫终于使玛莎同意，我们在莫斯科时住在他那儿，而不是下榻在原先计划的“萨伏依”旅馆。（我更喜欢住在这家旅馆，但阿罗谢夫——正如后来变得清楚的——把这件事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事。）他决定亲自照顾我们，并借助于我获得苏联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好感。只是在几天后我们才明白这一点。我们怎么会知道，由于经常失策，他的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的地位已摇摇欲坠到了何种程度，而希望利用我们又成了一次失策。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阻止他上维也纳、甚至几乎上瑞士迎接我们。他尽力效劳，巴结讨好，如此热烈地进行劝说，以致最终我们表示同意，尽管高尔基欢迎我们住在莫斯科他自己的家中。阿罗谢夫对我们的同意作了非常奇怪的回答：“谢谢你们没有斥骂！”他赶紧打电话通知家人，让他们收拾住房迎